



宋代佛教

史籍研究

曹刚华著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949.2
C112

黄永年题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曹刚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949.2
C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曹刚华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617-4543-5

I. 宋... II. 曹... III. 佛教-史籍-研究-中国-宋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0907 号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著 者 曹刚华
责任编辑 姜汉椿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8.37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4543-5/B·255
定 价 1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黄夏年

佛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来自西天佛国印度,在东汉时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这时传来的印度佛教受到中国佛教徒的研习,经过消化和吸收,开始走上了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道路。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正式完成了对外来佛教吸收与消化的阶段,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这也是中国佛教鼎盛的时代。宋代是中国佛教开始世俗化的时期,之后佛教在中国影响不断增大,但是在创新方面已经不如以往,到元明清时,中国佛教已经逐渐衰落,直到现在才开始有所回升。

宋代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世俗化的方向固然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宋代佛教又具备了一些以往从没有过的特点。举例来说,在思想上,宋代的佛教更加强调三教合一的思想,许多高僧,如契嵩等人都把三教合一作为佛教思想的特点。在宗风上,禅宗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高僧雪窦重显提倡文字禅,创制《颂古百则》,评唱禅门公案,阐明禅门玄旨,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克勤禅师创作了《碧岩录》,解释公案,使公案意思更加明显,便于人们的理解,扩大了禅宗的影响,将重显开创的文字禅的风气引向深入。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云居道膺及其传人提倡默照禅。这时天台宗也在四明知礼的中兴下,盛极一时;华严宗在杭州大行,此外,律宗、法相宗都有人在研习。在实践上,佛教徒热衷于忏法仪式的创造,同时还以念佛趣向净土结社为主要的信仰方式,由是推动了净土思想的流行,形成了事实上的净土宗运动。宗门内部也形成了禅净结合的新思潮。在文化上,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编纂佛教事业,雕刻藏经成为佛教界的一件大

事。佛教经典的创作曾经掀起过一个高潮,除了不立文字的禅宗僧人造作大量的经文语录之外,再就是撰述了众多的佛教史书。

现存宋代佛教史籍共有四十余部,^①重要的有《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隆兴编年通论》、《释氏通鉴》、《宋高僧传》、《禅林僧宝传》、《净土往生传》、《天台九祖传》、《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大宋僧史略》、《释氏要览》等。三百二十年的赵宋王朝,一下撰述了如此多的佛教史著作,这无疑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也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宋代的史学发达,至少应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应该得益于唐代佛学的发达。唐代的发达译经活动和宗派的建立,促进了佛教内部义学的发展。到了宋代,印度佛教的主要经典皆已译出,于是教界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到中国佛学理论的建设,其中除了像禅宗和天台宗等宗派的教义建设在不断创新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史学的梳理,特别是灯录、统纪之类的著作出现,无不是这一时期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二是唐代士大夫入佛的举措深刻地影响了佛教人士,促使了教内外的人对佛教教义理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史学建设的重视。三是佛教史学的发展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有关。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是讲宗法性,佛教也要受到这种影响,并且将它贯彻到佛教理论建设中来。像这一时期出现的强调宗门正统地位的著作,既是儒家宗法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佛门内部在竞争势态的前提下,展开的一种竞争手段,尤其在禅宗与天台宗两家身上表现明显。四是佛教寺院经济的发达,唐代百丈怀海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思想,到了宋代已经成为寺院制度,寺院经济完全自立,不再依赖于外在的护法和布施就能做到谋生,这为僧人能够有充分的经济外,还可以无忧地从事理论与文字的建设工作。五是朝廷对佛教的保护,像《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著作,都是在朝廷的支持下而撰修的,并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入藏流通的。

① 此处据曹刚华先生的统计。

上述五个原因为一个整体,不能分开。但是从思想上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即在三教合一的思潮下,佛教史学不得不在撰述思想上向儒家思想靠拢。《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曾说:“周孔行弟子之职,讲信修睦崇德报功。一统无遗,百王有愧。四海若窥于掌内,万机皆发于宸衷。”^①儒家的学问讲道统,以学问传承为正宗。佛教内部更讲传承,以尊祖师为其特点。所以明代西蜀辅慈沙门明显在撰写《佛祖统纪·阅佛祖统记说》时总结:“夫道无统则散,统无纪则乱,散乱之作,道理焉依。然道因言显,理假教明,诂离言教而觅道理乎。试将此典喻村落也,能诠名句喻牛也,所诠诸义喻乳及酥酪醍醐也。若谓直取醍醐上味,勿劳牛乳等义,请君于牛乳外,别觅一醍醐味可乎。欲明古圣之道,此统纪斯甚至焉。”《佛祖统纪》是天台宗僧人志磐撰写的一部主要记述天台宗法统的著作,明显将它提到了道统的高度,强调有道无统是不行的,有统无纪也不行,这无疑说明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佛教史学著作的撰写,所以凡是宋代出现的佛教史书,目的就是要维护道统,维护道统也就维护了法统。自宋代以后,佛教界一直存在着道统或法统合法性的争论,像禅宗的天皇道悟与天王道悟之争,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都包含了争正统的因素,虽然有的是以佛学理论的形式出现,但是每当指责对方的时候,就会提出法统纯正性的问题,而且这种争论越往后越严重,到了明代,佛教界撰出的灯录更多,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记述宗脉的宗谱,认为“灯以传道,统以继脉。设道之不明,统之不正,先圣所忧也”。^②在重庆大足还出现了专门勒碑刻石的《临济正宗碑》。^③佛教界的道统之争,到了清代,不仅成为教内的斗争,而且还将教外人士也拉了进来,甚至皇帝亲自出面支持某一派,名曰“辨魔拣异,舍邪归正”。此外,宋代政权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儒家的思想特点是讲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因此佛

① 《宋高僧传·序》。

② 丈雪通醉《锦江禅灯》凡例。

③ 参见拙文《大足石刻〈临济正宗记〉碑研究》,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2005年第5期,四川社会科学院。

教史书的写作,就是体现了社会的纲常礼教,所以《宋高僧传》的撰写,呼应了“我应运统天叡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阳龙挺德斗电均威,践大道也,牺黄翰执御之劳,多天才也”^①的背景,起到了“副陛下遗贤必取之心,助陛下坠典咸修之美”^②的盛世修典心态,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永资圣历俱助皇明,齐爱日之炳光,应嵩山之呼寿云尔”。^③即借助于皇家的势力,让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下去。

总之,宋代的佛教史学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宋代佛教的一个特异的现象。宋代佛教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史学的创作更不可忽视。研究宋代佛教,不得不重视史学著作的撰写,正是由于佛教史学的发达,使宋以后的佛教研究充满了大量的史料,但是由于撰写者多是出于各种目的,所以辨甄史料也成为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当前我国对宋代的研究正在开展,然而取得的成果还是有限。像宋代佛教史学著作研究,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摸索,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是比较系统地研究,在我国还不多,曹刚华先生敢于做前人少做的工作,一心扎在宋代史学研究里面,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同时他的成果也应该得到学术界尊重。

我与曹刚华先生从不认识,几年前他在做这一课题时,曾经给我写过信,我们互相在网上进行讨论,取得过一些共识。我认为,曹先生选取这个课题做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在读博士期间,放弃了很多活动,一心钻研,阅读大量资料,最终写出了这本专著。从整体上考察了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刊刻、流传及现存情况之总貌,尤其讨论了佛教史学撰写的指导思想,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对佛教史学的创作提出了看法,这些有益的讨论,对未来者的研究将起到接引后来者的作用。功莫大焉,因之为序!

2005年10月27日

①③ 《宋高僧传·序》。

② 《宋高僧传·进高僧传表》。

序

周少川

曹刚华博士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完成的。

中国的佛教史籍是伴随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兴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尤其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史学,善于“察古知今”、“鉴往知来”的传统,以及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多样性的丰富成果,都从各个方面滋养、促进了中国佛教史学的产生和进步。

中国古代佛教史籍的撰著开始于僧传,至少在晋代,已有一批记载僧人事迹的专传和类传出现,流传至今的《法显传》便是东晋僧人法显的自传。梁朝释慧皎在他的《高僧传》中提到不少自晋以降的僧人类传,其中如法济的《高逸沙门传》、法安的《志节沙门传》、僧宝的《游方沙门传》、郗景兴的《东山僧传》、张孝秀的《庐山僧传》;以及南齐后出现的一些总传,如竟陵王萧子良的《三宝记传》、琅琊王巾的《僧传》。^①《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了一批梁朝时撰著的僧人总传,除慧皎的《高僧传》外,还有虞孝敬的《高僧传》、释宝唱的《名僧传》、裴子野的《众僧传》,其中释宝唱还撰写了颇有特点的类传《尼传》。^②从僧人传记开始,中国佛教史籍不断发展繁荣,积累了包括纪传、编年、传记、游记、志乘、经传、灯录、纲目、目录、类书、笔记等多种体裁、卷帙浩繁的佛教史文献。

在中土产生繁荣并绵延不绝的佛教史学传统,不仅是其他国家的

① 释慧皎《高僧传》卷十四《序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中华书局,1973年版。

佛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也为中国史学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的遗产。内容广泛的佛教史籍不但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因而它们是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史料。

遗憾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史学囿于“方内”、“方外”之分,忽视了中国佛教史籍的重要价值,未能对这些文献进行开发和利用。直到1942年,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才冲破了这种局限,揭开了运用近代史学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史籍的开端。《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收录了由梁迄清,包括僧传、目录、护教、灯录、笔记、音义等各种体裁的三十多部佛教史籍,深入评析考证其书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内容体制等诸方面的情况,为系统研究佛教史籍树立了典范。然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并非一般的佛籍考证或佛教史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佛教史籍在史学中的广泛意义和史料价值。正如陈垣先生所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息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①论佛教史籍的补史、考史价值,为史学研究开一“新园地”,^②正是陈先生这部著作的鲜明特点和创造性发明。

刚华博士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继承了陈垣先生关于佛教史籍研究的学术传统。不过,当刚华与作为指导教师的我讨论确定这一选题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与他在陕西师大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对佛教史和佛教典籍有所接触,并打下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相关。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佛教史籍发展到宋代完成了各种体裁的确立,多种新体裁和宏编巨制的佛教史籍在此期出现,使宋代佛教史学达到一个承上启下的鼎盛阶段;而对于宋代佛教史籍的巨大成就,学界仍

①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未对其展开整体的、多方位的研究。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考察了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它的主要学术价值,首先在于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宋代佛教史籍的编纂、刊行和流传,展示了这一文献群体的基本面貌。其次,将宋代佛教史学纳入中国史学史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考察,从材料和理论上阐释宋代佛教史籍的体裁体例、宋代佛教史学思想的认识,并探讨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之相互促进。其三,充分重视发掘宋代佛教史籍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探索两宋时期佛教思想与儒家学说进一步融合及相互影响的特点,揭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宋佛教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和政治史上的史料价值,是刚华在书中着力讨论的内容。从文献研究的角度上讲,只有深刻说明宋代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才庶几可说解决这一文献群体如何“有助于史学”的问题。虽不能说刚华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圆满了,但他所作的努力,是有其可供参考的价值的。书中对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立意和多方探索,亦属难能可贵。因此,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各位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宗教典籍,历来因其教义和宗教词汇的奥赜而令不少研究者视为畏途。刚华虽然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宋代佛教史籍的,但也不能完全回避上述的难题。再者因为宋代佛教史籍文献繁富,要从众多典籍中爬梳史料,并作理论上的综合贯通,也有很大的难度。可喜的是,刚华并未在这些困难面前却步,而是以刻苦耐劳的精神一部一部地阅读文献,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次第展示了他数年的研究工作。当他的论文写作进入关键时期,北京正遭受“非典”的袭击,在严峻的气氛中,刚华不为当时某些慌乱情绪或无所事事、逍遥度日的行为所左右,而是更加潜心地投入研究和写作。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学人用心向学、奋发进取的优良品格。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是刚华辛勤工作和深入钻研的结晶,当然也倾注了不少专家学者指导的心血。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教授,黄教授与我们并不相识,但是当刚华求教问业时,他总是给予耐心、热情的指导。借此机会,我要向黄教授致以诚恳的感谢。因为他的无私帮助,不仅嘉惠刚华,也是对我教学工作的大力支持。

诚如上述所言,由于宋代佛教史籍的卷帙繁富以及佛籍研究的难度,曹刚华博士的这部著作对于宋代佛教史籍的探索只是初步的,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仍可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书中未及的领域也需继续考察。我愿刚华于此书出版之后,努力精进,在宋代佛教史籍和其他中国佛教史籍的研究中,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

是为序。

2005年12月

绪 言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意义

中国佛教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源流,又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因而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也是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源。中国佛教史籍的学术价值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首开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之先河。然而,应该说对于中国佛教史籍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至今仍很缺乏。因此,本书拟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入手,争取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关于中国佛教史籍概念之界定,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未有明确说明,后续学者亦无人论及。佛教史籍就其属性而言,具有宗教、历史与文献三种属性。宗教性指它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产物之一,和中国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中国佛教的形成、存在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互动影响。史学性则指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佛教发展史或佛教人物事迹等内容,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文化价值。文献性则指它是以某种材料为载体,靠编撰、复制而传播的一种文献,因此对佛教史籍的研究亦应注意其文献流传的过程。我认为中国佛教史籍的界定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就佛教史籍而言,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佛教史,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文集与语录虽也有涉及佛教史的材料,但严格来说仍不属于佛教史籍,故未列入。广义的佛教史籍,则与佛教史料学颇有相同之处,它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历史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释老志》、《旧唐书》、《宋史》等正史关于僧人的著作记

载、传记以及方志、别史、经幢、碑铭等。限于时间与本人的学识、精力，本书拟将狭义概念上的佛教史籍确定为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范围为宋代佛教史籍，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总的看来，宋代历史文化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承上启下性。一方面宋代文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汉唐文化基本模式和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宋代历史文化中的怀疑、批判和关注现实等精神又为明清文化发展开创契机。二是社会性，即宋代文化一反六朝隋唐时社会上层对文化垄断的态势，而是深入社会民间，文化平民化的特点十分明显，文化中心逐渐从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转移。三是开放性，有宋一代的文化始终充满着不墨守成规、不安于凝滞、提倡文化交流的风气，这种开放观念，在经学界则表现为“疑古”思潮之兴，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宋代与邻国文化交流之盛。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宋代统治者的倡导和佛教徒的宣扬、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流传，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多有信佛之人。宋代文人陆游曰：“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致遐陋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②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记载，宋代景祐元年，全国僧人已达385 522人，尼48 742人。可见，佛教在宋代相当繁荣。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时期，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达至繁荣，各种新体裁的佛教史籍在此时期出现，基本完成了各种佛教史籍体裁的确立。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著录中国佛教史籍有三十五部，宋代佛教史籍就有十一部之多。此外，宋代佛教史籍上承魏晋隋唐佛教史籍之优秀传统，下启明清佛教史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九《法云寺观音殿记》，《四库全书》本，以下引用的宋人文集，凡是未特别标出的，皆是该本。

籍之撰述,尤其对世俗史学之影响甚为深远。这些都足以表明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国佛教史籍上独具魅力。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本书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产生于两宋的中国佛教史籍。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意义。从广阔的视野来看,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意义有以下四点。首先,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佛教史籍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与地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并流行开来,逐渐与世俗文化相融合,隋唐时期这种过程进一步加深,两宋时期,佛教文化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土传统文化之中,三教(儒、道、佛)思想由斗争走向趋同,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嬗递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而由佛教僧人与居士撰写的佛教史籍,恰恰从佛教的角度出发,记录了当时佛教发展、融合的这一过程,不仅如此,也记录了当时佛教徒眼中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及民众思想。这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也看到,虽然已有学者注意到宋代佛教史籍的个案研究,但把其作为一个群体文献来做整体研究的,仍然不够深入,目前几乎尚无人问津。因此,本书试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学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多学科,开展交叉研究,力图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能有所补益。

其次,从宋代佛教史籍发展这个侧面可以了解中国佛教发展的概况。两宋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隋唐时期出现的众多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在宋代多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禅宗在宋代更为盛行。同时,佛教的发展与当时的帝王政治及儒、道二教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进程也已完成,许多佛教的神被民间请入到祭祀范围,并与民间诸神、道教神相融合,形成具有中、西特色的新的世俗神。这些佛教发展史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官方典籍中则反映甚少。如《宋史》只在《方技传》中著录少许僧人,如洪蕴、志言、怀丙、智缘等,这种著录明显具有以儒家为主的偏见性,与宋代佛教的繁盛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后代学者研究宋代佛教史造

成不小的障碍。而我们通过对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两宋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如可以利用佛教感应传来研究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可以利用《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来研究唐宋时期佛教与政治、三教融合与斗争的关系;可以利用宋代佛教史籍来研究中日、中朝等中外佛教交流史等等。这些宋代佛教发展史的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反映。

其三,对于中国佛教史籍史料价值的研究,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是开山之作。他在这部书中精选数十种佛教史籍,以提要的形式不仅从版本、流传方面,更对史料价值加以考证和论述,称是为史学研究所开之“新园地”,^①对中国佛教史籍提出开创性研究。但这一研究领域后续工作仍很缺乏,尤其是对宋代佛教史籍史料价值的整体开掘,更为罕见。可以说,本书之研究意在继承陈垣先生之志,为中国佛教史籍史料价值之挖掘作出新的补充。

其四,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对宋代以降佛教史籍的编撰,还是对世俗史学文献的编撰都有深远的影响。元明清时期,佛教史籍层出不穷,如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明代如惺《明高僧传》、镇澄《清凉山志》等。这些宋代以后所撰写的佛教史籍皆受到宋代佛教史籍在编撰体裁和体例上的影响。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体裁和体例对世俗史书也有不少的影响,如宋代禅宗的灯录撰写极为盛行,当时及后世的儒家学者皆相仿而作,宋代朱熹《伊洛渊源录》、明代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皆仿灯录体体裁,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故而,通过对宋代佛教史籍体裁和体例的深入研究,可以阐明中国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史上的影响。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20 世纪以前的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宋

^①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 8 月版。

代以后(包括宋代)的官方典籍与目录对宋代佛教史籍的著录与评价,如《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二是宋代以后(包括宋代)私家书目对宋代佛教史籍的著录与评述,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整体看来,由于20世纪以前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官方与士大夫对佛教典籍的著录与评价有失合理之处,并且著录佛教典籍的分类也较混乱,^①不存在较系统的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佛教与佛教史籍研究的发展,新的治史方法传入国内,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对中国佛教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或结合刚传入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古代佛教问题作多方面的考证与研究,其中一些著作或论文都涉及到宋代佛教史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一是论述了中国佛教史籍在中国目录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如梁启超于1926年在《图书馆学季刊》第3期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位置》一文,概括了佛教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发展与价值,展示了佛教经录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点。作者进一步指出佛教经录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认为学术越发达,则派别愈细分,佛教经录的细分类之发展与“应于时势要求,自然之运也”^②实有关系。文中对于宋代佛教经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亦均有提及。此外,相关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论文还有费锡恩的《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文华图书馆季刊》1935年第12期)、日本学者板原闡教于1937年在《微妙声》第四期上发表的《佛典目录学大纲》等。二

① 参见拙文《试论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

②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位置》,《梁启超集》,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是此期有的学者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系列的考证,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陈垣先生,他于1946年至1947年间,先后在《大公报》、《辅仁学志》等刊物上发表《题〈辅行记〉》、《宋元僧史三种评述》等系列短文。他从体制和内容、台禅二宗之争、山家和山外之争、版本之源流四个方面对南宋佛教史籍《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进行缜密的考证和论述,对于此二书做了开创性的史料挖掘;再者,他对宋代佛教僧人的笔记《林间录》、《罗湖野录》等也都做了较详细的考证。这些论文高屋建瓴,见解深刻,至今对我们研究宋代佛教史籍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的看来,这段时期对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为以后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理论性不强,没有注意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二是研究范围较窄,或是在整个佛教经录研究体系中稍有提及宋代佛教经录,或是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个案研究,没有更深入地扩大和挖掘整个宋代佛教史籍的范围与内容。

第二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

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左倾思想横行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宗教研究鲜有人敢于问津。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亦是如此,研究著作方面,仅有陈垣先生于1955年出版《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研究论文方面,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也处于零星状态,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多涉及唐代佛教史籍,这一时期国内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处于低潮时期。相比而言,港台地区与日本等地的学者对于中国佛教史籍研究则尚有可取之处。港台学者蓝吉富从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佛教史籍(《中国佛教史学的规模及其特色》,《内明》1972年第3期),曹仕邦的《中国僧史上的沙门社会活动资料》(《大陆杂志》1972年第8期)则利用中国佛教史籍的相关记载对佛教的社会活动加以考释。日本学者丸田教雄的《宋僧赞宁のイム教史观》(《中国佛教史籍の基础研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1973年6月)、安藤智信的《〈宋高僧传〉著者赞宁